

東台灣國家與族群之歷史研究的回顧*

孟祥瀚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一、前言

東台灣族群多元，文化多樣，族群研究一直是東台灣研究的重要課題。而東台灣的發展受到國家的影響甚鉅，國家的影響也深刻作用在族群的遷移、社會組織、文化變遷與產業發展等層面。本研究回顧擬以國家與族群的相互影響為論述軸線，經由上述各層面，討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東台灣族群歷史發展的特色。

東台灣族群歷史的發展，就國家的角度而言，無論荷蘭時期在採金政策下與荷蘭人接觸的卑南族與阿美族，清代封山禁令與開山撫番政策下入墾的平埔族群與漢人，日治時期移民政策下的日本人，以及「理蕃」政策下的高山族群，都被編入國家的統治秩序下，賦予不同的身分與國家角色。國家勢力的介入，不僅改變族群之間的關係、影響族群內部社會關係網絡，也主導產業的發展，造成社會生活的變化。

就族群的角度而言，遷徙為其重要的歷史特徵，在遷徙的過程中，受到國家力量長期的作用，所導致關於族群之間，或是族群與土地之間的若干相互內化的現象，也是值得討論的面向。而國家對

* 本文由2013年9月發表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與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合辦，「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的研究回顧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增補而成。感謝會議評理人潘繼道教授提示補充修改意見，以及論文審查人提供之增補意見。

東台灣族群發展的影響，不僅於當代，也對後代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

本研究在上述歷史架構上，整理並檢視近二十年來，有關國家與東台灣族群史的研究，並試圖指出主要的研究方向與貢獻，也進一步說明其中的不足或有待後人補充的部份，作為未來持續探究此一議題的參考。

二、東台灣的國家與族群史議題的提出

東台灣的族群研究自日治時期以來，即以原住民為中心而開展，其不僅為學術研究的課題，亦與統治政策相關。而東台灣的族群議題的討論研究，卻是由人類學開始。自日治初期至戰後相關之種族分類、居住環境、生活方式與信仰習俗之調查研究，成果豐碩。民國 94 年（2005），東台灣研究會主辦之「區域研究與學科發展：以東台灣研究為中心」討論會中，人類學者黃應貴教授指出東台灣的人類學研究對於台灣人類學的研究的可能意義在於：¹

- （一）多族群間的頻繁互動。
- （二）社會文化的流動性-頻繁的文化採借與轉換。
- （三）當地南島民族對於移入漢人之社會與文化的影響。
- （四）現代國家對於當代地方社會與文化的衝擊-國家化、資本主義化、或邊陲化與再中心化。

上述的觀點指出東台灣族群研究中二項重要的特點：（一）東台灣的社會特質之一，即漢人在數量上並未居絕對多數，且因歷史因素自清末、日治時期與戰後陸續移入，形成多元族群文化並立，

¹ 黃應貴，〈東台灣的人類學研究〉，見夏黎明主編，《戰後東台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工作實錄》（台東市：東台灣研究會，2005），頁 51-52。

婚姻、語言、風俗與信仰相互接納，族群雖然多元但文化彼此滲透的情況也非常明顯。（二）國家政策造成東台灣的邊陲性、與國家力量主導之資本主義發展，對於當地族群與社會發展所造成的衝擊，是造成東台灣社會文化發展特殊性格的營力因素之一。

因此對東台灣區域史的研究而言，如人類學者陳文德所指出者，無論其歷史、聚落或是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發展，「都必須考慮到聚落族群之間的互動，並跳脫漢人為主的思考方式」。族群研究「必須置放在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中才会有更適切的理解。」²陳文德所指出的族群互動、跳脫漢人思考方式與社會文化脈絡，均為東部族群研究的重要思考基點。而影響東部族群發展的長期性因素，除了地緣關係外，東部的歷史發展過程，特別是國家的力量，做為影響族群發展的一個外部因素，就必須特別加以重視。

國家在東台灣歷史上的角色，林玉茹指出荷治時期係以資源掠奪為主的象徵性統治，清代由封山劃界到開山撫番的統治過程，但光緒元年設置行政區域後，統治的範圍仍然僅限於漢人拓墾的區域與撫番政策施行的區域為主。日治時期在 1924 年前，將東台灣特殊化並由民間企業主導開發，1926-1936 年間，為備戰下的資源調查與基礎建設時期，1937-1945 年為戰時國家與企業共同開發時期。³可知，歷史上不同政權對東台灣的統治重心不同，東台灣各族群受到國家統治的影響面臨何種調整與肆應，則是東台灣族群史研究上一個重要的課題。

近代以來，在國家的編排下，族群的定義與界定常在不同的歷史情境與統治過程中轉變。對國家而言，自清代的「番」，至日治時期的「高砂族」（簡稱蕃人），背後所代表的是具有優勢政治、

² 陳文德，〈東台灣「族群」的研究〉，見夏黎明主編，《戰後東台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工作實錄》，頁 56。

³ 林玉茹，〈國家在東台灣歷史上的角色〉，見林玉茹，《殖民地的邊陲-東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7），頁 73-85。

經濟與武力的族群對於不同文化、不同血緣之族群的認知與支配，以及在此概念下所衍生之統治政策的差異性。清代以國家為中心，依統治的距離將台灣原住民分為「生番」、「化番」與「熟番」，三者的身分依國家設定的界線而決定，在國家統治內賦予不同的角色。日治時期，原住民身分依統治區域被分為「蕃地蕃人」與「居住普通行政區域蕃人」，其身分仍然是由國家所決定。另外，平埔族群與漢人移入東部後，在國家統治脈絡下對於原住民身分的安排，如何將其納入統治秩序內，是為國家與族群接觸後第一步的思考。其次，在統治過程中，各項政策之推展，也造成各族群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與運作、宗教風俗等層面的影響甚至改變。對族群而言，在國家所設定的身分下、在肆應國家統治的過程中、以及在與其他族群互動的過程中，族群如何對應身分的轉變，以及族群彼此的界線是否因此而調整因應等，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族群史放在歷史學的研究脈絡中，國家與族群自身或彼此都是造成改變的力量，使得歷史學在國家與族群的互動過程中，有了切入探討的面向。

三、基礎史料之整理、出版與流通

近二十年來，台灣史的研究在基礎史料之整理出版成果豐碩，並在數位化政策的推動下，陸續建置相關資料庫，使得研究者能夠更加細緻的爬梳史料，開發新的研究議題，與深化研究的面向。就東部地區族群史的研究而言，荷蘭西班牙時期之檔案，江樹生編譯之《熱蘭遮城日誌》（四冊）、程紹剛譯註之《荷蘭人在福爾摩沙：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江樹生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二冊)、⁴李毓中之《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⁵、Borao Mateo, Jose Eugenio (鮑曉鷗)之《Spaniards in Taiwan》⁶、方真真《臺灣西班牙貿易史料(1664-1684)》⁷等。十六世紀以來，歐洲商人往來麻六甲、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間，台灣由於航途所經，成為矚目的焦點，過去的討論重心主要集中於台灣西部，而台灣東部在十六、七世紀東亞海域歷史發展中能否開啟另一與台灣西部經驗不同的研究視角，日治時期尾崎秀真曾引用日本古史大事紀記載阿美族人前往日本晉見幕府將軍，以及綠島蘭嶼歐洲人曾以菸草命名，說明沿著台灣東岸所建立的東亞貿易動線及其與東海岸族群的互動關係，以及東台灣在大航海時代所扮演的角色，有著新的探討意義。

清代的檔案近年來台北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明清檔案與中國大陸之檔案，或出版或建置資料庫，提供了東部地區在清末國家化的過程中更清晰細緻的觀察。例如清初以來對於所謂「生番」的治理態度與政策，「番界」如何形成與變動，「番界」內外的漢番關係與界外原住民的遷徙互動等，透過檔案，將能更細緻的理解，東台灣在國家統治過程中的定位。牡丹社之役後，國家力量延伸進入東部，國家化的過程中，族群關係與身分被重組，其中的衝突與調肆，又是另一課題。光緒三年大港口之役，清軍圍剿奇密社阿美族人的事件，有關清軍殺俘的記載，早年主要見諸伊能嘉矩之《台灣蕃政志》，其後在故宮檔案中發現相關奏摺，對於事件的始末，有了較明確的官方記載，但官方記載與阿美族人自身

⁴ 江樹生，《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⁵ 李毓中，《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8。

⁶ Borao Mateo, Jose Eugenio (鮑曉鷗). *Spaniards in Taiwan*,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⁷ 方真真，《臺灣西班牙貿易史料(1664-1684)》，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6。

對於事件過程之傳述二者之間卻出現相當的落差，對於事件的研究由此更開啟了一個探討的空間。台灣大學圖書館建置之「淡新檔案」數位資料庫有關清末土地清丈的紀錄，對於東台灣土地清丈過程中，土地關係如何重新安排，以及透過土地關係如何重新編排不同族群在國家內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線索。

日治時期的檔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以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為中心之相關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建立，⁸《理蕃誌稿》與《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之出版與翻譯，⁹以及系列以時間與專題為主編譯的檔案，¹⁰對於日治時期國家勢力如何在東台灣建構與發展的相關研究，提供重要的檔案基礎。國立台灣圖書館建置之「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與東台灣有關之資料。橫向查詢之「台灣學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等提供研究者更完整與便利的研究資源。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出版之系列《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與《蕃族調查報告書》等。¹¹另外，楊南郡整理編譯並出版日治初期烏居龍藏、伊能嘉矩、

⁸ 包括以總督府公文類纂 A3 以下版面之檔案為主之「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系統」、「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查詢系統」，內容包含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A3 以上版面之檔案（圖面）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日據時期與戰後史料查詢系統」包含台灣總督府檔案、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台灣省級機關檔案、台灣省政府委員會議檔案、台灣鹽業檔案、台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專賣局局報等。以及「台拓檔案、生管會檔案、機關學校檔案目錄查詢系統」等。

⁹ 《理蕃誌稿》之翻譯見《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至四卷。《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之翻譯見徐國章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共四冊）。

¹⁰ 如《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一輯至第十一輯。王學新，《日據時期東臺灣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1998）。顏義芳，《日據時期臺灣地區殖產史料彙編與研究》（2000）。王學新，《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1)：風港營所雜記》（2003）。黃德峰、王學新，《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2)：處蕃提要》（2005）。

¹¹ 《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1996）、《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2000）、《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1998）、《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2001）、《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2003）、《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三冊》（2003）、《蕃族慣習調

鹿野忠雄、移川子之藏與森丑之助等有關東部之調查記錄等，¹²對於了解日治初期東部原住民與日本帝國帝國接觸時，如何被編入近代國家與學術的體系，提供更深入一層的思考。

戰後與東部地區國家與族群史的研究，主要集中於相關歷史事件上，例如二二八事件、台籍軍人、原住民、榮民義胞等課題。相關檔案的梳理主要集中於國家如何動員與管理，以及這些族群與在地的關係。

近年來在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與國史館台灣文館的合作之下，出版系列台灣原住民史專書，¹³這套書有關歷代國家治理部分

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四冊》(2003)、《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五冊》(2003)。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阿美族南勢蕃·阿美族馬蘭社·卑南族卑南社》(2007)、《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阿美族·奇密社·太巴塢社·馬太鞍社·海岸蕃》(2009)、《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四冊·賽德克族太魯閣族》(2011)、《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泰雅族-前篇》(2012)、《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巒蕃·達啓覓加蕃·丹蕃·郡蕃·干卓萬蕃·卓社蕃》(2008)、《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七冊，泰雅族-後篇》(2010)。

¹² 楊南郡，《臺灣百年前的足跡》，臺北市：玉山社，1996。楊南郡，《台灣百年花火》，臺北市：玉山社，2002。中藺英助原著、楊南郡譯，《鳥居龍藏：縱橫臺灣與東亞的人類學先趨》，臺中市：晨星出版社，1998。鹿野忠雄原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臺灣高山紀行》，臺北市：玉山社，2000。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6、2012 再版。山崎柄根原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臺灣山林的博物學者》，臺中市：晨星出版社，1998。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0。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臺灣踏查日記》，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6、2012 再版。鳥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6、2012 再版。移川子之藏等原著，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市：南天書局，2012。

¹³ 其中與東台灣相關者如康培德，《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1)荷西明鄭時期》，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溫振華，《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2)清治時期》，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7。藤井志津枝，《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3)》，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1。宋龍生，《台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8。童春發，《台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1。葉家寧，《台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余光宏等，《台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余光宏、董森永等，《台灣原住民史-雅美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由歷史學者執筆，討論歷代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的統治政策，有關各個族群的部分則由人類學者主筆，由於整套書以原住民歷史為主題，因此各書內容也多著墨於歷史變遷的部分，如葉家寧之布農族史篇，內容探討布農族之發展、歌謠至口傳時期的發展，遷移過程及與異族的接觸、以及外來政權對布農族人的影響及布農族的回應等。許木柱之阿美族史篇，則討論阿美族之起源、擴散以及各群的遷移。童春發之排灣族史篇則討論各種歷史地圖中顯示之排灣族之聚落分布與擴散，部落的形成與發展、外來政權與宗教的影響，以及部落的反應等。

這套書由人類學的研究出發，探討族群的遷移與演變，與歷史研究的課題接軌，對於傳統著重文獻檔案的歷史研究而言，提供了重要的啟發，官方文獻中作為在地族群的「番」，在與外部勢力（國家或不同族群）接觸後，本身的衝擊與影響，以及回應的作為，由此所產生的官方檔案與族群歷史的對照，在東台灣研究中，是一個值得鼓勵的研究方向。

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與國史館台灣文館亦陸續出版了另一套以專題研究為主的原住民議題叢書。其中與東台灣相關者如林素珍、林春治、陳耀芳等之《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七腳川事件》與《阿美族當代宗教研究》及《長光部落-社會文化變遷與發展》、海樹兒·戈刺拉菲之《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變遷史》、謝世忠、劉瑞超之《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台灣都市阿美族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康培德之《泰雅族 msbtunux 的美麗與哀愁-頭角與奎輝部落 Kbuta 世系群家族史》、許勝發之《原住民部落起源及部落變遷史-以魯凱族下三群為例》、董恕明之《Ina 傳唱的音符-pinaski 部落變遷中的女性 1980-1995》、王建臺、姜穎之《布農族的狩獵-歷史、空間與權利》、黃東治、邱韋誠之《阿美族棒球-身體、文化

1998。喬宗志，《台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8。許木柱，《台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1。

與認同》、童春發之《台東縣金崙河流域的區域發展與族群關係》等。上述研究議題跨進當代歷史的領域，擴大原住民史研究的時空縱深與論述內涵，開發了新的研究議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東台灣在地原住民學者的參與，他(她)以自身歷史文化為對象所作為分析研究的對象，其嫻熟自身的語言與社會風俗，因此在看問題的視野、詮釋史料的角度、以及對與研究議題情境之理解，使其論述過程果能夠更貼近實際的歷史情境，對相關現象與材料作更細緻的探討，形成台灣原住民歷史研究上的特色。

四、國家作用下的族群史相關研究

(一) 荷蘭西班牙時期

17世紀，荷蘭人為探採金礦，自恆春半島越過中央山脈進入東部地區，後來雖未達成開採金礦的目的，卻在東部地區建立集會區，開展了荷蘭人在東部地區的傳教與通商事業。荷蘭人在東部地區的事業主要集中於南部之卑南一帶，接觸之族群包含排灣族、卑南族及阿美族。康培德之《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一書，透過荷蘭時期檔案，呈現十七世紀東部阿美族群的聚落分布與名稱，與荷蘭接觸後，對聚落勢力消長的影響，以及與西部地區不同的殖民經驗，如文化接觸後物質文明所帶來的不平等關係，而非行政統治與信仰改變等長期性的殖民經驗。本書透過歷史資料建構東部阿美族的早期歷史，以及部落之間的消長關係，建立一個新個研究取向。黃宣衛認為本書將花蓮地區阿美族的研究縱深向前延伸至十七世紀，突破先前以十九世紀之文

獻檔案為主的研究方式，並開啟相對於西部地區研究經驗的東部後山原住民與十七世紀東亞海洋歷史互動接觸的歷史。¹⁴

誠然，先前歷史學討論東部地區的發展，主要以牡丹社事件之際開展之開山撫番政策為切入起點，在開山撫番政策下，設置行政組織、駐兵派防、招攬移民、清丈土地、壓制反抗等系列國家作為將東台灣納入國家的統治過程中，東台灣的歷史論述即由國家力量的介入而開展。而此由國家觀點切入的歷史論述雖能掌握宏觀的歷史發展架構，但對於地方社會的變化，卻難以聚焦。康書以花蓮地區阿美族的歷史變遷為中心，內化國家因素成為變遷的原因之一，在以國家為中心的歷史論述中，開啟一條不同的研究取向。

（二）清領時期

1. 封山禁令下的東部族群關係

康熙六十年（1721），爆發朱一貴事件，事平之後，清廷避免漢人進入深山與原住民勾結，引發治安問題，於是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下令沿山劃界，禁止漢人越界。此後隨著漢人越界私墾日益嚴重，乾隆二十五年重定番界，沿界設置隘寮，攔查民番出入。番界劃定之後，雖然漢人越界之事仍然時有所聞，但多限於中央山脈西側，番界內外漢人之越界開墾。對台灣東部而言，卻不啻將整個中央山脈西側山腳以東的區域完全隔離起來，直到光緒元年（1875）因牡丹社事件，清廷為防杜外人所謂後山不屬版圖的說法，於是銳意推動開山撫番政策，亦即將東部的國家化。

然而東部地區雖然長期處於被隔離的情況，但是中央山脈山區人群的遷移並未因此而停止，施添福認為在番界的隔阻下，泰雅族、

¹⁴ 黃宣衛，〈關於阿美族研究的若干省思-從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一書談起〉，《東台灣研究》7（2002.12），頁167。

布農族等原居於中央山脈西側的族群陸續向東遷移。這批向東遷移的族群，除了在東央山脈東側建立聚落外，並與原居於中央山脈東側山腳一帶之阿美族與卑南族造成衝擊，地方的族群關係因而重組，也造成阿美族群在縱谷與海岸地區的遷移，各族群的勢力範圍因而重新劃分，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移入之西拉雅系與噶瑪蘭系平埔族以及漢人，一開始只能在各族群之間勢力範圍外緣的土地耕墾居住，並與鄰近之阿美族、布農族與卑南族產生競合的關係。施添福的論文探討了在開山撫番前夕，東台灣的族群分布、遷移與相互間的關係仍然是處於一種動態發展的情況，在清廷官方力量鼓勵漢人入墾後，族群的分布與互動又進入到新的歷史情境內。施添福的研究指出官方勢力對東台灣的影響，不僅始於開山撫番時期，而應從更長遠之清初理番政策之番界開始。

潘繼道之論文，更聚焦於西拉雅與噶瑪蘭二支平埔族向東部遷移的歷程，特別是入墾東部後，與當地族群互動的關係，以及在清季國家力量進入後與之對抗調整的歷程。

施添福與潘繼道的討論著眼於清末開山撫番以前，中央山脈之高山原住民族與居於平地之平埔族群向東部遷移的歷程。在此指出的問題在於「國家的影響力」不僅始於清末開山撫番的時期，而是在一個更長期深遠的影響過程，國家的力量雖然未直接作用在東部地區，但國家的政策具有之連動性，仍然在一段時間後延伸過來，造成族群遷移以及後續之一連串遷移的現象。潘繼道的討論指出若是由區域史的概念來看，地區內的族群關係在發展一段時間後將達成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其後若是有新的族群加入，這種平衡的狀態將被打破，經過一段時間的震盪後，再達到新的平衡狀態。清季國家力量的進入，以及同時移入之漢人，對東台灣都是新進入的勢力，開山撫番期間清廷與當地阿美族、平埔族的衝突，可視為是新舊勢力重組的過程。因此，國家力量在融入一個新的區域時，並非

是順理成章，國家背後所代表的支配力量與地方既有之勢力勢必產生對抗與衝突。

於是，清代封禁期間東台灣的族群關係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此課題包含二個面向，一為東台灣原住民族之間原有之通婚與結盟網絡，這部分人類學者已做過許多的研究，此處不再敘述。二為平埔族與漢人之入墾、居住並與當地住民通婚的情形。此二面向之共通點都是封禁期間東台灣與西部之間仍然有著相互往來的動線。此動線原為前後山高山族群往來的路線，後來則成為平埔族與漢人進入後山，或是後山各族前往山貿易的動線。陳英之〈台東志〉曾詳細說明卑南與西部近山一帶排灣族部落貿易的情況，甚至漢人也至此與卑南族貿易，來自枋寮的商人鄭尚甚至娶卑南族女為妻。¹⁵楊南郡調查整理之《浸水營》將古道賦予歷史與族群的文化風貌，不僅豐富了在地研究，也透過古道的歷史，重新省視與古道相關之各族群互動的歷史。在學術研究的意義上，以往經由官方觀點紀錄的歷史檔案，原住民族的面貌是模糊的，僅是作為貫徹國家意志的對象，透過征討與綏撫的手段，達成目的。但現今原住民族研究日益細緻，每個地方的原住民族有著自己的社會權力網絡，國家力量的進入，勢必引發權力關係的重整，原住民族如何對應，以及對事件的敘述，都是值得關注的，亦即歷史的書寫，必須兼顧國家與族群二個面向的互動與思考。

2. 清季開山撫番時期族群移入與互動

國家力量對東台灣的影響，清季開山撫番時期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東台灣開始被編排進入國家的統治秩序內，區域內各個族群也被賦予新的身分，被納入不同的治理脈絡中。另一方面，東台灣的新舊住民如何適應新的情勢與相互關係，亦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¹⁵ 陳英，〈台東志〉，收錄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東州採訪冊》書後附錄。

詹素娟經由噶瑪蘭族人遷移至花蓮平原後，與當地太魯閣族、沙基拉雅族與奇萊各社關係的建立，檢視有關噶瑪蘭人之歷史紀錄與在地記憶，指出文獻歷史雖然有徵，但反應的是「說話者」的立場，而「傳說」卻能突顯噶瑪蘭人在當下的選擇與認同，用以化解外來者與在地者的落差。¹⁶何者才是「真實的歷史」？如前所述，國家力量作用下的族群關係，仍需自族群端觀察其本身如何思考其處境。詹素娟的論文指出政府檔案所見的仍是國家秩序建立的過程，較缺少對於當地住民境況的理解。族群關係的編排，在國家的影響之外，住民自身如何看待與解釋，亦是個重要的課題。

對東台灣而言，清季國家力量進入之際，東台灣當地的族群關係仍在重組調整的過程中，噶瑪蘭族人、西拉雅族人、阿美族、卑南族，泰雅族，以及布農族等仍處於對抗、競爭與調適的狀態。國家力量的進入，對於這些族群間的關係是否產生影響？潘繼道的論文指出光緒四年（1878）「加禮宛事件」後，奇萊平原地區原住民族族群勢力重新洗牌，其中抗官的撒奇萊雅族與噶瑪蘭族的勢力瓦解並遷移他處，七腳川社勢力崛起，成為南勢阿美群中最強大的族社。太魯閣族的勢力也漸往近山與新城海岸發展，成為後山北路近山強勢的族群。¹⁷

而清季國家力量進入東部後，國家對於地方的管理機制如何建立，與原住民族之間產生何種衝突？李宜憲認為清末清廷在東台灣的設官分職，只是形式上的治理，對原住民族的統治而言，掌握實質權力者為通事，營官與通事的合作構成官方在後山的權力結構。因此，在大港口事件中，通事林東涯代表官方力量對土地與資源的控制，但也承受當地阿美族群對國家力量進入部落的不滿，因而遭到

¹⁶ 詹素娟，〈傳說世界與族群關係-加禮宛人在花蓮地區的歷史與傳說(1827-1930)〉，《新史學》17：1（2006.3），頁1-39。

¹⁷ 潘繼道，〈加禮宛事件後奇萊平原與東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活動空間變遷探討〉，《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3（2009秋季號），頁25-60。

殺害。¹⁸開山撫番之初，通事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一開始官方藉通事之力，逐漸與原住民族建立互動的關係，但通事勢力漸增建強之後，對官方的統治反而造成威脅，但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成為統治上的問題，例如清末之陳輝煌與日治初期之李阿隆都曾經引起官方高度重視。

另一方面，國家力量進入東台灣後，對人口與土地秩序的重新安排，展現在賦稅的過程中。清末在東台灣推動之的清賦事業，除了欲在土地上建立起漢人形式的保庄等基層單位，另一方面，在地權方面則是將漢人、噶瑪蘭人、西拉雅人均視為業主亦即承認彼等民的身分，對於東台灣族群關係的發展而言，平埔族群在土地關係上開始被視同一般漢人，對東部地區的族群關係而言，自是一大轉變。¹⁹

（三）日治時期

1. 國家勢力深化的影響

日治初期國家體制開始延伸進入東部地區，國家體制影響的層面包含土地調查、地籍登記、戶籍登記、保甲、行政區域等。國家制度全面地施行，將每個人納入到國家編排的身分內，施添福指出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每個人都被編入國家所安排之三種空間系統內，包括每個人身處的行政空間，治安的警察官空間與原有生活脈絡的部落民空間。對漢人而言，如此的安排與其既有之生活型態差異不大，清代的地方社會原本便包含鄉里、保甲與祭祀。但是對於

¹⁸ 李宜憲，〈大港口事件-晚清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東台灣研究》10（2005.12），頁 5-36。

¹⁹ 林玉茹，〈由魚鱗圖冊看清末後山的清賦事業與地權分配型態〉，見林玉茹，《殖民地的邊陲-東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 88-121。

東台灣的原住民族而言，卻是巨大的變化。李宜憲討論日治初期官方統治的機制，認為清末的撫墾署與日治初期的隘勇線形成地方行政之蕃地與普通行政區域，警察與成文法的實行，形成原住民社會內的一種新的規範與社會秩序，生產方式的改變則造成部落內部倫理關係遭到挑戰。²⁰

潘繼道的專書討論了日治初期日人統治深入各族群過程中所遭遇的抵抗與事後的影響，作者以七腳川事件與太魯閣討伐事件前後，國家力量強制族群遷移，造成社會生活的衝擊，以及族群勢力地弱化，完全為國家掌控。日人因而得以進行各項殖產事業與移民工作。²¹

李敏慧指出在霧社事件後，日人對居於新武呂溪上游之布農族人展開了大規模的集團移住，不僅改變了卑南河流域布農族原本的聚落分布型態。由內本鹿社移住到都巒山西部山腳所形成的上野、中野、下野三個部落則成了海岸山脈僅有的布農族部落。也使新武呂溪河階上之各部落因成為鄰近散村的移住地而得以集村的形式存留，生產方式由輪耕狩獵轉為定耕農業，固有的信仰也日益式微，日本式的生活逐漸取代其原有的生活方式。²²鄭安晞也指出 1930 年代，布農族丹社群經由集團移住，進入花蓮縣萬榮鄉一帶居住後，生活方式與習慣也隨之改變。²³

林聖欽則討論花東縱谷中段在國家政策下，日人引入製糖事業後，吸引西部地區漢人前來，與原居的阿美族人與平埔族人一般以

²⁰ 李宜憲，〈東台灣日本統治體制的建立與原住民的民族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²¹ 潘繼道，《國家、區域與族群-台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的歷史變遷(1874-1945)》，台東市：東台灣研究會，2008。

²² 李敏慧，〈日治時期臺灣山地部落的集團移住與社會重建--以卑南河流域布農族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1997。

²³ 鄭安晞，〈日據時期布農族丹社群遷移史之研究(1930~1940年)〉，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佃農、雇農雇工的身分拓墾土地，不僅造成區域土地的開發，也造成族群關係的改變。²⁴糖廠的建立，需要大量人工種植甘蔗，常吸引西部地區的漢人入墾東部，因此，蔗作是日治時期吸引漢人入墾東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蔗作的背後，則與國家設規劃之資本主義發展有關。鄭全玄即討論台南之王家在東部藉耕種會社土地而發展的案例，糖廠土地的開發，吸引移民進入，也常造成鄰近聚落的發展。

²⁵

孟祥瀚則由林野調查、番社行政、行政區域建立、聚落整併、保甲系統、收繳武器等層面討論成廣澳地區阿美族人部落在進入日人統治之際的調適與轉變。²⁶

黃宣衛以「國家、村落領袖與社會文化變遷」為主軸探討日治時期成功鎮宜灣部落的發展，指出部落雖然面對國家強大的力量，但部落的社會文化仍有相當的作。透過部落領袖的產生過程與生平事蹟的探討，將更能細緻的觀察國家力量滲透進入村落的過程，以及部落面對外來力量的回應。²⁷本書在國家與族群歷史的議題上指出日治時期國家與地方部落的關係，並非僅是國家端強勢介入主導的過程，部落內部之社會文化仍然具有對應調適的能力，由部落端的角度來看國家力量的進入，將更能掌握國家與族群互動的關係。

延續部落對國家力量回應的課題，賴昱錡則由日治時期東台灣阿美族人勞動力的釋出為題，探討日治時期東台灣公私建設、拓墾事業、移民與產業開發過程中，阿美族人都擔負了大部分的勞動力，

²⁴ 林聖欽，〈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1800-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1995。

²⁵ 鄭全玄，〈台東平原的移民拓墾與聚落〉，中市：知書房，1995。

²⁶ 孟祥瀚，〈日據初期東台灣的部落改造-以成廣澳阿美族為例〉，《興大歷史學報》13（2002.6），頁 99-129。

²⁷ 黃宣衛，《國家、村落領袖與社會文化變遷：日治時期宜灣阿美族的例子》（台北市：南天書局，2005），頁 168。

而官方警察又透過何種何種機制訓練動員阿美族人從事「強制苦力出役」，以及出役的過程中，與其他部落或族群的青年接觸時，對阿美族青年產生的影響等。本文作者以自身成長經驗中了解阿美族人在日治時期從事大量的勞動動員的情形，開始收集整理相關文獻與口述訪談，論述日人對阿美族人的動員機制，對與日治時期國家對原住民的動員提出深刻的探討，並指出動員過程對這些被動員離鄉的阿美族青年所造成的在社會文化上的衝擊。²⁸本書特色不僅只在探討國家對阿美族勞動力役使的過程，也反思阿美族社會在動員的過程中受到的影響。

2. 移民事業

日治時期國家對東台灣族群史發展的另一影響則是日人移民村地設置。張素玢由總督府的移民政策、移民村地設置、栽培作物、社群組織與社會適應、民族摩擦等層面討論日治時期台灣移民事業的成效。²⁹戰後，日籍移民遣返日本後，移民村成為當地民眾的聚落，但日本移民遺留下來的廟宇或地神碑，卻逐漸內化轉換成為當地漢人信仰的一部分。³⁰亦為東台灣族群關係上另一特殊的現象。

（四）戰後時期

戰後東台灣的族群史主要以客家研究與外省榮民地討論為主。近年來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支持下，進行多次有關東部地區客家

²⁸ 賴昱錡，《你今天做苦力了嗎-日治時代東台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新店市：國史館，2013。

²⁹ 張素玢，《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5-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台東市：東台灣研究會，2001。

³⁰ 潘繼道，〈花蓮縣吉安鄉日治時期遺跡〉，《台灣文獻》別冊 12（2005.3），頁 7-17；別冊 13（2005.6），頁 2-12。潘繼道，〈瑞穗鄉瑞北村的地神碑〉，《台灣文獻》別冊 23（2007.12），頁 22-31。

族群的調查。黃學堂與黃宣衛的調查，認為台東地區的客家族群大致可分為平原區、縱谷區與海岸區三類。各區各有其不同的移墾脈絡與產業生計，移住台東雖近百年，但既能保存傳統傳承，又能揉合新的成分，呈現在地化的新風貌。³¹

外省榮民在國共內戰期間隨著政府遷台，部分榮民則被分發至東部地區，一部分進入政府成立之榮民之家安養，一部分則被安排拓墾荒地，即建立兵工墾區與農場，有關農場的生活與步調，如在部隊一樣，但隨著年齡漸大或是結婚搬出，農場的經營也受到影響。兵工墾區則是給予未耕種的荒地，由其自墾自耕，所熟知土地則由其所有。

五、東台灣族群史研究的特色與待深入的議題

東台灣族群史的研究首先的面臨的是「族群」在哪裡、與「族群」是誰等空間分布與內涵定義的問題。日治時期以來，人類學者對於東台灣族群議題的討論與研究，例如在族群分類、聚落分布、語言、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生產方式等層面都已見相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也成為歷史學者在切入東台灣族群史研究時，重要的討論基礎。由此而塑造東台灣族群史研究的特色之一：

（一）跨學科的合作與對話：如上所述，東台灣的族群研究由人類學者發其端，地理學者、歷史學者與社會學者繼而開發擴展相關議題，將族群的發展變遷放在更長遠的時空發展脈絡加以觀察。由此形成東台灣歷史研究的特色，長期以來由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參與，藉由跨學科的合作與對話，開拓相關課題。

³¹ 黃學堂、黃宣衛，〈台東縣客家族群分布及其社會文化特色〉，《東台灣研究》14（2010.2），頁89-150。

(二) 在地學術社群的支持：東台灣雖然被稱為後山，但學術研究的努力並未成為台灣學術研究的邊陲。其中一項重要的因素即是在地學術社群的長期支持，「東台灣研究基金會」匯集國內各領域學術研究人員針對東台灣的相關議題展開深入的對話與研究，對東台灣的歷史研究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就東台灣族群史的研究而言，國家的議題一直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長期以來已累積相當研究成果，惟仍有部分尚待開拓與深入的地方，值得注意。

(一) 國家的實質：國家作為影響東台灣族群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對於國家的內涵為何，實有必要加以探究。清代施行封山禁令，清廷對於封禁地帶的族群與土地在國家統治的脈絡中究竟是如何看待的？封山禁令放在清朝對於邊緣非漢民族的態度與政策中思考時，所反映的是何種統治思維？在此思維下，「番界」、「社餉」、「番社」與「番人」等由國家編排的統治秩序對於其所指涉的民與番的地位與身分又將如何思考？開山撫番時期，國家以鎮壓展現其統治實力，與落實統治秩序，東台灣當地的平埔族、阿美族、卑南族與布農族等又如何解讀這種統治秩序？國家所統治的對象與國家在統治過程與統治秩序中，是否有著交集的對話，或者國家（包含漢人）僅是進入東部的另一股勢力而已。日治時期東台灣作為統治的邊陲，與資本主義的邊陲，東台灣的資源與族群都被設定在國家統治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邊陲脈絡中，而台灣總督自身的統治理念與施政作為？東台灣各族群身分角色的編排，是與總督府施行於全台的統治政策一般，或是僅針對東台灣？

(二) 與西部地區的對比：東台灣的族群史背後涉及的國家因素，是否具有台灣西部的共同性？前述之封山禁令下東部與西部原住民族、漢人與官方的互動，開山撫番政策下，桃園新竹苗栗一帶的管理與拓墾經驗與東台灣的比較，日治時期原住民族的統治政策

東台灣與西部地區在政策的過程中經驗的比較等。行政體制、警察系統、產業發展等東部與西部之間在執行過程中差異，對於族群關係造成的影響等。

（三）在地族群自主性的發展：東部地區族群歷史的發展，受到國家的影響甚深，而在國家的力量作用後的發展，也是值得關注的課題。移墾者在國家力量的引導下進入東部地區，從事產業的開發，但定居下來，不可避免地將與鄰近族群產生互動，例如通婚、語言與信仰等，族群的邊界開始產生重疊的現象。此種現象在東台灣多元族群的背景下，特別值得重視與注意。